



# 生死行军

## ——红军长征过草地

王家宏 蒋天知

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。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,红军面临了诸多恶劣自然环境的挑战,包括爬雪山、过草地、渡江河等等,特别是红军草地行军被党史学者称为“生死行军”。红军征服“杀机四伏”的茫茫草地,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拖不垮、打不烂的具有钢铁般意志的英雄部队,红军悲壮的草地行军是中国革命惊天地、泣鬼神、苦难而辉煌的篇章,它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制胜的精神密码。

### 错失战机只得过草地

1935年6月12日,中央红军(原红一方面军)翻越夹金山后,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。蒋介石考虑,倘若川西北的红军与川陕红军合兵一处,然后纵横于陕、甘、宁、新数省,打通国际通道,与苏联相呼应,形势将不可控。他迅即成立西北“追剿”纵队,令胡宗南为纵队司令。西北“追剿”纵队成立后,胡宗南很快调集大军于陇南及川甘边境地带集结。胡宗南认为,平武和松潘两镇乃川西北扼住红军北上陇南的要塞之地,特别是松潘,则是川西北经陇南的咽喉所在,得之可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”,失之则处处被动。

早在四月下旬,因红四方面军迟缓了一步,松潘便落于敌胡宗南部。其时,红军已经占领川西北的茂县、理县懋功等岷江西岸地区,要向陇南北上甘陕,就不得不走松潘这条通道。毛泽东认为,击破胡宗南之南进,是这一计划的关键。毛泽东已经看出,胡宗南占据了岷江两岸的懋功、松潘、理番地区荒凉贫瘠,红军难以解决给养,是不宜建立根据地的,同时也阐明向南或向大西北进军也不合适的理由,向陕甘进发建立根据地才是正确的选择,陕甘一带地域宽阔,人口较少,物资亦充裕,不仅能扩大红军规模,也能解决红军补给。红军应迅速北上,打败胡宗南占领松潘,为北上陇南扫清障碍。

在这次会议上,张国焘提出反对意见,他认为,胡宗南已在陇南集结了20多个团的兵力,即便红军到了那里,也难以站稳脚跟,提出南下攻打成都的建议。与会者一致反对张国焘的意见,张国焘口头上服从中央决定。

6月29日,中革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精神,拟定“松潘战役”计划,旨在趁胡宗南初到陇南,主力尚未集结、碉堡亦未构筑完成之际,一鼓作气打败胡宗南。这时,红一、红四方面军有十万之众,胡宗南也正在集结兵力,各项部署正在准备中,红军若果断出击,打他个立足未稳,拿下松潘平定陇南是非常有把握的。

但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决策,他所掌控的红四方面军迟迟不北上,执意坚持南下成都。为了争取张国焘,整个7月都在又团结又斗争的争论中耗费了。战争讲究兵贵神速,张国焘的自私和错误使红军错失战机——敌人已在松潘要道上构筑好碉堡和壕沟,张开大网等着红军去钻。7月底,国民党各路大军于岷江一带形成铁壁合围之势,东邻岷江,南接大雪山,北连草地。敌人在这里集结了200多个团的兵力,东面是薛岳的中央军130个团,南面

是川军刘湘的50个团,西面是川军刘文辉的15个团,北面是胡宗南的27个团,正像一张大网铺天盖地而来。

此时,红军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俱失,已全面丧失战机,中革军委被迫放弃松潘,不得不取道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。要过草地,红军就必须占领另一军事要地——毛儿盖,毛儿盖东距松潘50多公里,其战略地位次于松潘。防守毛儿盖的敌军虽然只有一个加强营,但敌军凭险固守,以逸待劳,红军尽管在兵力上处优势,却打得十分艰苦吃力,前后鏖战8天才拿下毛儿盖。

### 不屈不挠艰难行军

红军所经过的草地,是十分独特的川西北自然地貌,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接合部,长达250多公里,宽达150多公里,海拔3500米以上,由于在历史上属松潘县管辖,故而也叫松潘草地。新中国成立后,重新调整了松潘一带的行政区划,现分别由松潘、红原、若尔盖、阿坝等县管辖。当年红军过草地走的时间最长、走得最艰苦的是若尔盖草地,这个草地是几路红军都经过的地域。

红军过的草地,其实就是高原湿地,里面汉河密布,因到处淤滞而成沼泽。草地气候恶劣,变幻无常,时而雷鸣电闪大雨倾盆,时而晴空迷雾,且昼夜温差大。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的雨季,本来低洼泥泞之地,加之大雨倾泻,草地顿成漫漫泽国,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过的草地,其险情其艰难可想而知。

(一)红军过草地常有被吞噬的生命之危。红四团作为过草地先遣团依靠藏族向导摸索前行,试图为全军探出一条道路并设下标记,他们踏着千年沼泽的草甸,在沼泽的草地找出一条曲折的小路。但是,由于连日阴雨不断,淹没了红四团设置的路标和行进路线,后续部队进入草地后便身陷险境。

亲历长征的老红军刘统回忆道:“举目荒凉,一片草野,四周矮山也不长一棵树木。一路腐质土浸满了污水,没有草根的地方,脚踏下去直没过膝盖,马儿经过处,埋没了四蹄”“我们的脚从出发以来都未曾干过”“看不到一个鸟儿飞过,也听不到一个鸟儿叫声”。红军过的草地,许多地方河沟交错,淤黑色的积水,散发出腐臭的气味,沼泽地上的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潭,红军只有选准大如蒲团的草墩儿作为落脚点,从一个草墩儿跃上另一个草墩儿,若不慎便会身陷泥潭,招致被吞噬之灾。

更令人生畏的是,草地的一些地段接连几十里水深没膝,甚至藏族向导也难以找准正确的行进路径,一些战士因而身陷淤泥而丧生。当一个战士腿陷泥潭,身旁的战士伸手拉同伴时,自己也极可能同样陷进去,其他战士用同样的方法抢救,往往也会招致同样的命运。有的战士身陷泥潭,还来不及抢救,整个身体就已经被淹没。有些骡、马等牲畜陷入泥潭后凭着本能拼命地挣扎,却不料越陷

越深,牲畜的身躯被淹没时,可怜水面上只留下一串串水泡。

红军战士渐渐摸索出了有效的救人方法——当一个战士不慎身陷淤泥时,其余的战士赶快解下几条绑腿带,将绑腿带的一头地给陷进泥潭的战士,让他将带子捆着腰,然后将其拉上来。

(二)红军过草地要忍受饥饿之苦。饥饿是红军草地行军的另一大威胁。草地行军之前,尽管各部队进行了充分的筹粮工作,但川西北地瘠民贫,物资匮乏,草地行军若7天左右,那么每个红军战士需要5至7公斤粮食,但因条件所限,有的部队甚至只筹到两天的干粮。

草地行军的战士,每人身上背的一小袋青稞麦粒或青稞麦粉,成了他们的保命粮,青稞麦粒差不多一颗颗地数着吃,麦粉也省了又省,本来麦粉就少,若是被雨水淋湿,就变成了难以下咽的粘疙瘩。战士们身上的青稞麦粒和麦粉,两三天就吃完了。还有大半的路程只得靠吃野菜、草根、树皮充饥。这些“食物”有的有毒,吃了轻则上吐下泻,重则中毒身亡。前面的部队将野菜、草根、树皮吃了,一遍,后面的部队连野菜、草根、树皮都没得吃,无奈之下只得将皮带、皮鞋,甚至皮毛坎肩和靴子煮来吃。

有一个叫谢益先的红军战士,在刚进入草地时正碰上一个面黄肌瘦的妇女带着两个很瘦弱的孩子,他将仅有的一袋干粮给了她和孩子们。大家在吃饭时,他就悄悄地在附近找野菜吃,有时找不到野菜就喝点凉水充饥。后来他再也支持不住了,便倒了下去,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负责殿后的红军战士准备的干粮更匮乏,能吃的野菜、草根、树皮更少。所幸三军团有六匹骡马,于是军团长彭德怀命令全部杀掉。就是这几匹骡马,救活了许多红军战士。

(三)红军过草地要忍受寒冷之苦。红军过草地虽然是8月下旬,但草地天气却变化无常,时而烈日,时而冰雹,时而暴雨,时而大雾,且温差极大,晚上气温有时忽然降至零下六七摄氏度,雨雪交加,狂风怒号。

而红军战士大多数穿的是单衣,不少战士还穿着草鞋,有的甚至打着赤脚,在寒夜里冻得瑟瑟发抖。更兼草地沼泽泥泞,几乎找不到干燥的地方,夜间睡觉都是一个难题。战士们将就着铺点东西露宿,有的卧在地上,有的坐着打盹,有的背靠背互相取暖,战士们在风雨中煎熬,可谓“饥寒交迫,冻饿交加”。

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描述过草地的艰苦情景:“过草地那些日子,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,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,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,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,软塌塌,水渍渍,大部分人挺过来了,不少人却倒下去了。”

(四)红军过草地要忍受极度疲劳和疾病之苦。草地行军,由于异常恶劣的气候及地理环境,加之饥饿与寒冷,战士们的体能已到了极限,处于十分疲劳的状态。茫茫草地,除偶尔能看到零星的灌木丛出于平缓岗之外,连一株树木都很难见到。人行走在其间,因缺乏判定方向的参照物,常常会迷失方向,有时

艰难地行走了半天,才发现又回到了原地,使人疲劳之极。

红军战士本来忍饥挨饿,还要在草地上艰难地跋涉,体力渐渐耗尽,不少战士走着走着就倒在野草丛中,再也未能爬起来。红军收容队发现过草地时每天有三四百人掉队,在晚上露营地时,这些人有的三五人一组背着背休息,待到第二天早上收容队去叫他们时,一推一个倒,摸一下才发现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,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红一团的一个班,他们在大雨中露宿了一夜,第二天吃早饭时,连长发现他们都没来,放开嗓子喊叫,却好长时间没有回应,过去一看,才发现这个班的战士已全部停止了呼吸。就在即将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,还发现成片的战士长眠在草地上。

草地恶劣的环境,使许多战士染上了疟疾及其他疾病。有一位来自江西石城名叫郑金煜的红军战士,因年纪尚小担任小宣传队员,刚进入草地时还生龙活虎的,时而唱山歌,时而讲故事,帮着背柴草,忙前忙后的,但不久后他突然发起了高烧,那时部队缺乏医药,团政委杨成武将战马让给他骑,把干粮匀给他吃,但他终究没有挺过来,临终前,他用微弱的声音对杨成武说:“政治委员!我不行了,感谢你对我照顾。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!革命一定会胜利。”说罢,抱憾而去,周围的战士没有不伤感流泪的。

一些战士本来已被疲惫虚弱,再遭到恶劣的草地环境和饥饿的双重煎熬,病倒了就再也爬不起来。很多战士没有倒在战场上,却因饥饿与疾病交加长眠在草地上。

红军过草地,是长征途中大自然给红军的重大考验,也是红军战士痛苦的记忆。诚如张闻天夫人刘英所言,“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,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”,走出草地后,“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”。草地虽然异常险恶,但英勇的红军凭着不怕困苦、不畏牺牲、不屈不挠的顽强革命精神,走出了这片令人恐怖的生死地。

### 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

红军之所以能战胜草地这一“自然之魔”,在于其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、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和乐观进取的革命精神。

党的领袖毛泽东在草地行军途中为了给大家鼓劲,给红军战士讲故事,使艰难行军的战士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;周恩来过草地时深受疾病折磨,但他从未动摇其理想信念,一次次坚毅地与大家一道走出了草地;林伯渠、董必武、徐特立和谢觉哉被人们称为党内“四老”,深受党内同志尊敬,他们始终乐观向上、步履坚定地走完了草地。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已年近六旬,他在徒步行军途中正好碰上了毛泽东,毛泽东问他为什么不骑马,老人诙谐地说:“我给马找到了工作,让它给红军大学三个生病的学员驮行李了。”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女红军战士,她们巾帼不让须眉,用女性特有的坚韧与生命极限顽强抗争,同样体现了红军战士的英雄气概。曾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蔡畅大姐,与战士们一道穿梭在沼泽草地间,挖着野菜来充饥,她还常给大家讲故事或唱革命歌曲,她坚定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周围的战士;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李伯钊,是红军队伍的歌唱家,也是戏剧家,在艰难的草地行军中,她以动人的歌声激励和鼓舞着战士们;还有身患肺结核的邓颖超,在长征途中受伤而身存多块弹片的贺子珍等女红军战士,她们信念坚定,勇毅前行,拖着伤病之躯走出了茫茫草地。她们还时常鼓励其他伤病员,一定要坚定信念,坚持就是胜利。

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,对共产主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,是红军能走过草地的根本原因。“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,就永远不会熄灭。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,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,一次次绝境重生,愈挫愈勇,最后取得了胜利,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。”没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,红军便走不完二万五千里长征,更走不出险象环生、时时带有生命之危的茫茫草地。红军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长征精神,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,是永远鼓舞中华儿女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。

## 拾遗

### 彭德怀:不争功不诿过

在朝鲜战场上,彭德怀不争功不诿过、勇于自我批评,听不得奉承的话。有一次洪学智对他说:“有您挂帅,我们就胜利在望了。”彭德怀瞪了他一眼说:“你别奉承我了。”

1951年10月,为纪念志愿军入朝参战一周年,朝鲜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。彭德怀说:“我有什么功劳值得授勋?我不过在后方做了一些具体工作。这个勋章应该送给那些战斗英雄。”中央军委复电,让他尊重朝鲜政府的决定。10月25日,朝鲜政府代表团来志司驻地检阅,将一级国旗勋章佩戴在彭德怀胸前。彭德怀对此感到不安,托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说:“这勋章送给我不合适。”

1954年10月,遵照军委总参谋部指示,邓华组织参战者撰写《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》。令邓华为难的是:彭德怀要求除了缺点、失误可以提彭德怀外,成绩、功劳一律不准写他的名字。后来只好用“志司首长”作为彭德怀的代名词,这才勉强解决了这一难题。1955年8月《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》完稿,彭德怀亲笔题写了书名。

### 曹禺:念批评信鞭策自己

晚年的曹禺添了一个习惯,就是每当有客人来访时,他总会取出画家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,然后当着客人的面大声念出来,这让许多人很是不解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美国著名话剧导演阿瑟·米勒应邀到曹禺家做客。午饭前,曹禺像往常接待其他客人那样,从书架上拿出那本装帧十分讲究的小册子大声读上:“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,一个也不喜欢。你心不在戏里,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,你为权势所误……命题不巩固、不缜密,演绎、分析得也不透彻。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、节拍、冷热、快慢的安排,那一箩筐的废话都消失了。”

如此措辞严厉的信,曹禺竟毫无顾忌地读给大家听,使在场的人大惑不解,更让米勒如坠云雾。米勒曾专门撰文描述了自己当时的迷茫和后来的感动:“我当时真不明白他恭恭敬敬地把这封信放在专册里,又把它用感激的语气念给我听时是怎样想的。后来我终于明白了,这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!尽管他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剧作家,却不放过爱惜自己的荣誉与名声,他的清醒和真诚,让我无比感动!他的‘傻气’,透露出他对自己作品中存在的艺术缺陷的真切悔悟,并把那封信作为鞭策自己的珍贵礼物,时刻让自己清醒着。”

### 柳公权:颜筋直隶

柳公权的字劲紧严正,骨力道健,故谓之“柳骨”。人如其字,这位书法大家秉性耿直,刚直不阿,颇如其峻峭峭骨的书风。

唐穆宗当政时期,生活放纵,痴迷声色。一日早朝,穆宗心血来潮,对柳公权说:“朕近时在练字,却总感不得要领。卿对此造诣较深,可否作经验之谈?告知朕如何运笔。”

柳公权想了想说:“以臣的体会,用笔在心,心正则笔正,心不正则笔也难正。”他讲的听上去是运笔之法,实则是规劝穆宗端正品行,做一个明君。

穆宗自然听出柳公权的弦外之音,脸色十分难看,但因喜爱柳公权的才华,最终没有发作。

### 溯源:“女士”本指女中豪杰

如今称呼女子,多将“女”与“士”相连,殊不知,在古代,这个称号可不是一般女子能承受的。我们看唐代孔颖达为“女士”所做的注解:“女士,谓女而有士行者。”说白了,就是虽然生为女儿身,但有一颗豪迈的心,有着男人的气概和节气,这就是女中之“士”。所以,“士”本来用来称呼男人,将“女”与“士”相连,就是形容其为女中豪杰。

可见,古代“女士”实指女中豪杰、巾帼英雄,并不是所有女子都能被称为“女士”。

## 罚过与赏功

### 清风慕竹

料,“其后小吏畏诛,虽有盗,弗敢发,恐不能得,坐课累府,府亦使不言。故盗贼浸多,上下相为匿,以避文法焉。”因为害怕不能及时捕盗被杀头,下级官吏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;而上级官吏也害怕受到连累,也诱使下级不要上报。于是上下相互打掩护,瞒实情,表面上一派太平景象,而盗贼却越来越多,治安状况愈发恶化。

东汉初年,光武帝刘秀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。一些地方官员在实施“度田”,即丈量土地以确定赋税的过程中搞数据造假,包庇豪强,因严重不公激起民愤,引发骚乱。《资治通鉴》里描述说:“东方盗贼滋起,大群至数千人,攻城邑,取库兵,释死罪,缚辱郡太守、都尉,杀二千石;小群以百数,掠卤乡里者,不可胜数。”在盗贼群起的地方中,“青、徐、幽、冀四州尤甚”。

面对这一极其严重的问题,刘秀没有采取“无为则刑”的策略,而是改为“有功必赏”的政策,效果也立竿见影。

针对地方官员,刘秀规定:“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,皆勿问,听以禽计为效。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,及以畏懦捐城委守者,皆不以为负,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,唯蔽匿者乃罪之。”意思是说,地方官员中那些停留拖延、回避不前、故意放纵盗贼的,都不再加以追究,那些郡守、县令犯了管辖区域内有盗贼而不收容捕罪过的,也因为害怕软弱丢弃城池和放弃职守的人,都不再视为过失,从现在起只根据捕获盗贼的多少来评定优劣,只有包庇隐藏盗贼的人才会被判罪。

这项政策的重点可以概括为:不问过失,只赏功劳。结果如何呢?《资治通鉴》里描述道:“于是更相追捕,贼并解散,徙其魁帅于他郡,贼田受粟,使安生业。自是牛马放牧不收,邑门不闭。”因为捕盗失败不会受到惩罚,捕盗成功则可以受到奖励,官吏们没有了后顾之忧,所以反而更积极地投入到打击盗贼的行动中,最终使得盗贼隐迹,百姓安居乐业,甚至治安好到夜不闭户的程度。

对比了汉武帝和光武帝管理官员的方式,洪迈总结说:“此二事均为治盗,而武帝之严,不若光武之宽,其效可睹也。”由此得出了宽胜于严的结论。在教育学上有“教子十过,不如奖子一长”之说,从激发人的积极性来说,奖励显然比一味地惩罚更有生命力。

## 历史随笔

## “三更”“半夜”缘何连用

许晖

“五更”是汉代开始通行的夜间计时制度,一夜分为五个更次,每个更次大约两个小时。“五更”也叫“五夜”,最初以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命名,称作甲夜、乙夜、丙夜、丁夜、戊夜;又叫“五鼓”,更夫用鼓打更报时。宫廷巡夜的警卫交接班,都以五夜来划分安排,闻鼓声交接班。

“三更”指夜晚十一点至一点,因此“三更”就是“半夜”。那么,为什么把“三更”和“半夜”连用呢?这岂不是重复了吗?原来,“三更半夜”这个俗语竟然还有阴谋的含义在里面。

此语出自《宋史·赵昌言传》。朋党是古代中国官僚集团特有的现象,士大夫们为了争取利益最大化,或者为了政治理想的实施,朋比结党。其中因科举而结成的朋党叫“科甲朋党”,“科甲朋党”是宋代以后最重要、最引人瞩目的朋党。

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(978),有三人中都中了进士,状元是胡旦,省元(第三名)是赵昌言,同榜中还有一位叫董俨。三个人都做了官,胡旦任起草诏令的知制诰,赵昌言任工部侍郎,董俨任掌管财政收支的度支副使。赵昌言和时任掌管盐、铁、茶专卖以及征稅事宜的

盐铁副使陈象舆关系很好,因此,虽然陈象舆不是赵昌言同年进士,但也加入了这个小集团,再加上上一位任右正言(谏官)的梁颙,五人结成了“科甲朋党”,成为当朝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,他们的主要政敌是当朝宰相赵普和太子元偁。

这个“科甲朋党”的小集团活动异常频繁,“四入者,日夕会昌言之第。京师为之语曰:‘陈三更,董半夜。’”不管白天深夜,他们总是聚集在赵昌言的府中商讨政事。由于是公开结党,因此朝野上下都知道这个小集团,京城民谣因而称之为“陈三更,董半夜”,“陈”指陈象舆,“董”指董俨。

这个小集团指使受人雇佣以抄书为业的佣书人翟颖上书诋毁时政,并且狂妄地自荐为重臣,又举荐可以充任辅臣的数十人。结果是宰相赵普流放了翟颖,同时将几人全部贬官,这个“三更半夜”的“科甲朋党”被一网打尽。

从此之后,“三更半夜”就成为一个固定用语,指深夜。

## 语词精奥